有所思

《礼记·礼运》中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大同”，代表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最高憧憬，表达了一种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追求。此一憧憬和追求，历数千年，始终是中华传统思想的主流，具有重要的价值。

“大同”理想的文化解读

□ 宋 玲

古典情境下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作为“大同”思想核心的“和谐共生”具体指什么，或者经由何种路径才能达至呢？古人给出了答案，这就是《中庸》所云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是说和谐共生的大同分为四个层次，或者从四个方面逐次递进。

和谐共生，要求自我安身立命，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儒家所谓凡事皆以修身为本，修身而后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道德修养最浅的层次，自然是“穷则独善其身”，最高的层次，则是“达则兼济天下”，最终要像尧舜那样成德成圣，到了尧舜之境，人的主体自觉性完全发挥，也必将把社会带到至善的领域。

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较之于个人的修身，这更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承担责任的路径，就是孟子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自己推演开去，尊重他人的生命与人格尊严。儒家所云的“生道”，并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等基本的生存，还有受尊重的需求。孟子甚至指出“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也就是说如果给予他人人道的对待，即便身死而无怨。毫无疑问，这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必由之路。

“民胞物与”。强调人与其他生灵的和谐相处。这是一种更为开阔的思想境界，北宋大思想家张载说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张载看来，因为人与万物的形体和性情，都是由天地之气塑造而成的，所以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天地间的人和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所以，我们对他人均应像兄弟一样去对待，对万物也应像对人一样去关爱。这无疑是孔子“泛爱众而亲仁”思想在宇宙领域内的进一步发挥。人与万物，共生共荣，万物调敝，人何以堪？关爱万物，实际上是滋养人类本身，民胞物与，方能臻于“大同”之境。

“与天地参”，亦即古人所谓的“保合太和”。这实则是一种终极的“天人合一”思想。庄子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很显然，单纯“人乐”，还不是最高层次，最高的和谐，在于人与自然的“天乐”。这昭示了古人对于我们所处的自然、所处的生态环境的一种关注。儒家所谓的“与天地参”，亦是“天乐”的另一种表达。

古人追求的“大同”之境，是一个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和谐要求普遍和合，由自己开始，经由他人、社会、万物乃至最终“与天地合其德”，铸就一个充满生机的共同体。

传统社会追求“大同”的实践举措

《礼记·礼运》中所述“大同”，无疑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描述。如汤一介先生所云，这一理想社会，包含着许多空想成分，且建立在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无疑是片面且难做到的。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不去做。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历朝历代都不乏趋向“大同”的实践举措，举其要者有三。

“别夷夏”与“进夷狄”的施政路径。夷夏之别，本就不是从血缘或种族上来区别，而是从文化或者文明的角度上而言。如果夷狄文化上有所进步，即便身处四裔，诸夏也不会复以夷狄视之，而如果诸夏文明不再，那么也会沦为夷狄之境。孔子面对中原礼崩乐坏的局面，就感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指夷狄都能讲君臣之道，而作为礼仪之邦的诸夏反而丧失了。所谓的“夷夏之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中更是指出“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这就是以一种文明发展论的眼光来看待华夷之别。理想的状态，是通过文化的传播和认同，最终使得原先文明落后的夷狄，达至先进的领域，即所谓“进于爵”。历代统治者所宣扬的“王者无外”，实则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王化即文化，化民成俗，将之逐步纳入王化当中。正如孔子所说的“近者悦，远者来”，最终通向大同之路。而别夷夏与进夷狄，所遵循的路径恰恰就是孟子所云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这样一个渐进的步骤。

“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度。中国虽然追求和谐共生的“大同”社会，但并不希冀用武力或者宗教，强行将不同民族或者种族归入“王化”之内，而是倡导“和而不同”的理念，对于他者的文化与制度，中国往往能够给予相应的理解和尊重。中国从未以文化或者宗教之名，对外发动过战争。恰恰相反，中国自古主张通过对话促进相互间的理解和尊重，传统思想主流也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传统王朝绝大多数时候能以一种包容和平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或者文明。当然，外来文化或文明能否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则得视其适应程度。譬如在唐代，西方的佛教、景教、祆教诸文化纷至沓来，但最后只有佛教发扬光大，这并不是中国政治势力扶植或者打压的结果，而是文化本身之张力的渗透所致。对于唐王朝而言，始终是立足本民族文化而对外来文明持尊重和宽容态度的。最经典的例子是唐律在处理“化外人相犯”时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该条律文的“疏议”解释为：“‘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长君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唐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律，但是唐王朝并不因之骄矜自许，必使在唐之化外人强行之，而是尊重各化外人本俗。只有当双方并非同一文化者，方才适用属地管辖，以唐律断之。这充分体现了传统大国各美其美且美人之美的气度。正所谓和而不同，方能天下大同。

“四海一家”的民族和外交政策。中国历史上，有开拓精神和政治理想的王朝，在民族和外交政策上，无不奉行“四海一家”的政策，而不是以邻为壑，自设藩篱。奉行四海一家者，也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四周民族或者国家，最终成为中华的屏藩。唐太宗在对待夷狄问题上秉持着开明的精神，指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正是有这样高远的民族和外交见解，使得唐王朝成为历史上最开放、最包容的王朝之一，周边原本不在中华文化圈内的民族，也纷纷内附于唐，尊奉太宗为“天可汗”。无独有偶，后来的努尔哈赤，亦针对民族区分说过：“天降大国之君，宜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此可见历史上大国领袖的担当与见识。而康熙针对臣下请其修长城防边患的问题，更直接提到：“帝王治天下，自由本原，不专恃险阻……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此话深得孔子近悦远来之道。伟大的治理者，善于化除民族的畛域，使四海团结为一家。既然内在的藩篱得以消解，则边境自固，天下自稳。这同样是渐至“大同”的治理之道。

“大同”理想的历史评价

传统“大同”理想及其路径，主要是文化核心通过文化涵摄的方式，逐步将夷狄纳入王化的过程，最终实现天下“大同”。中国古人很早就突破了地域和种族的局限性，他们关注的，不是一城一地、一族一姓的兴亡得失，而始终着眼于“天下”的福祉。这种超越时空的“大气”，也使得中国文化从来不会因为战争或者政局的动荡而丧失生命力。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同”思想，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它像一个黏合剂一样，将中华民族牢牢地黏合在一起，即便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理想，也使得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有了一个文化的基础。它从血缘上的联系入手，慢慢扩展及异姓异族，最终“夷狄进至于爵”，从而“天下一体”“王者无外”。如此看来，“大同”理想实在是理解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命运的一把最重要的钥匙。

半生惟独宿 一世不贪钱

——清嘉庆年间的朱珪

□ 胡海升

乾隆晚年，清朝的官僚体系日益腐败，和珅权倾朝野，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可以说是由盛转衰的征兆。嘉庆即位后，希望能重振吏治，挽回颓势。但是，内有官员中饱私囊，外有起义叛乱频发，国家已经积重难返。即便如此，嘉庆的勤勉还是值得肯定的，他肃清和珅集团，打击贪腐，启用一大批清廉能臣，无疑为清朝的夕阳残照增添了一抹亮色。朱珪正是乾嘉过渡时期的重要人物。

朱珪是浙江萧山人。他7岁入学，读的是四书五经，学的是经世致用。正如那个时期所有志在青云的读书人一样，他走过了艰辛的考学中举之路。15岁便入顺天府，从师顾河干先生，学习秦汉古文。1747年，乡试中举，时任刑部尚书阿克敦称赞道：子年少而魄力大。朱珪第二年即中进士，随后又任上书房行走。

帝师是朱珪的第一个身份。在他之前，乾隆曾经给皇子选派过几个老师，比如尚书奉宽、工部侍郎谢墉，似乎都没有收到很大效果。嘉庆帝从朱珪这里学到的也是四书五经、文章诗词，但是朱珪在讲授过程中，更注重将中国古代政治家治国理念和仁政思想编成故事穿插进来，或者理论联系实际，将这些思想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嘉庆帝十分喜欢。

嘉庆帝还是皇子时，勤学不倦，常年在书房中读书，忽一日，想到古代读书人皆有书房，尤其在命名上显出书房主人的雅趣和心志，便也想为自己的书房取名，想来想去，没有思路，于是询问师傅朱珪。朱珪说：勤学者有余，怠者不足，有余可味也，可命此书房曰“味余书室”。通过书房命名，朱珪将“勤学、勤政”的道理讲了出来。

4年上书房行走之后，朱珪被外调到福建省任学政，临行前为这位未来的帝王留下一封书信，其中讲到《五箴》，即养心，敬身，勤业，虚己，致成。这十字箴言后来被嘉庆帝当作座右铭，不仅成为修身养性的方法，还成为他后来勤政治国的准则。朱珪希望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落实到这位未来的帝王身上。

作为帝王师，朱珪对嘉庆帝宽仁政风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嘉庆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清代皇族入关后，开始还排斥汉文化，后来发现要想统治偌大的中国，必须精通其思想精髓。于是，儒家的修身治国之道成为清代皇子的必修课。能够影响皇帝施政和德行的，当然是皇子的老师。嘉庆一朝，朱珪对嘉庆的影响最为深远，包括其个人思想和施政风格。

1799年，乾隆帝去世，被后世史学家多有称道的康乾盛世落下帷幕，清朝陷入茫然无措之中。当天，在外任职的朱珪被召入京城供职，以辅助亲政不久的嘉庆帝。在回京的路上，朱珪上疏一道，力陈此后嘉庆帝应该遵循的治国方略，说道：思修身严城期之介，于观人辨义利之防。君心正而思维张，朝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俭崇奖清廉，万物昭苏，天信民顺。朱珪的上疏中说的依然是修身正心、利义之辩等儒家之道。

此后，朱珪在朝廷任职期间，始终向嘉庆帝进言要广施仁政，嘉庆帝在执政过程中，也将宽仁放在了首位。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处理和珅这件事上，甫一亲政，嘉庆就立即将和珅集团拿下，并准备来一次大刀阔斧的清肃。后来由于朱珪的进言和劝解，嘉庆帝没有大开杀戒，只是将和珅余党逐出内阁，并赐和珅自缢。

可以说，朱珪儒家宽厚的施政作风，有利于皇权平稳过渡，减少局势震荡。但从另一方面说，由于宽仁，没能将朝廷的不正之风彻底清除，使其继续在朝野蔓延，为清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清中期政治积弊日久，必须下以猛药，方能重振朝纲，刮骨疗毒，才能重获生机。这种宽仁的政风也体现在后期镇压白莲教叛乱之中，实行“剿抚兼施”，希望能够通过潜移默化的引导，使其消除暴戾之气，但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这也是朱珪的历史局限性。

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帝师，朱珪将儒家正统的仁政思想传授给了嘉庆。早期教授皇子读书期间，后来临朝辅政之时，宽仁始终都是朱珪的主导思想。

廉臣是朱珪的另一个人格身份。在嘉庆一朝任官，清廉和谨慎是必须的，才干倒在其次。大概是由于王朝后期，贪腐成风，清廉就显得十分可贵。朱珪一生品行清廉，虽然官至宰相，却刻苦如寒士。乾嘉之交，朝野贪官横行，吏治败坏，勒索民财，官官相护等不正之风大行，身为朝廷大员的朱珪却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清贫如故。

《朱文正公神道碑后记》中记载一则故事，颇能言明朱珪的清廉之风。朱珪在担任山西布政使时，有一个身为下级的诗文朋友，名叫吴重光。吴重光善于词赋，可以说和朱珪志趣相投，于是被当作知己。一日，朝廷下诏，调朱珪入京。他却苦于没有路费，只好将这位诗友兼下级叫进来，向其借钱200两，还发债券。吴重光一看惊呆，唯唯诺诺，哪敢接受上级的债券。朱珪严肃地说：你不要债券，难道是想贿赂我。吴重光只好接受了债券，第二天将200两送来。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朱珪身为主管一省财赋的官员，却穷到连回京的盘缠都没有。从中可以看出朱珪的认真和廉正品格了。

1806年，77岁的朱珪在乾清宫与嘉庆帝商讨国事，忽然眩晕倒地，不省人事。皇帝将最好的御医招来，为其诊视。没想到御医也回天无术，又过几日，朱珪病逝。

嘉庆帝对于朱珪的离世十分悲伤，连续颁布两道上谕。第一道说：“大学士朱珪持躬正直，砥节清廉，经术淹通，器宇醇厚，服官五十余年，依然寒素，家庭淳睦，动循矩法，徇不愧为端人正士，晋赠太傅，入贤良祠。”第二道说：“昨因大学士朱珪磕逝……赐谥文正……朱珪立朝五十余年，外而歇历督抚，内而洊直纶扉。”古代王朝，谥号是对一个人的盖棺论定。所谓“生有名，死有谥，名乃生者之辩，谥乃死者之辩”。名号是对活人的称呼，谥号是对死人的评价。朱珪死后，谥为“文正”。文正是对一个官员生前德行从政的最高评价。有清一代共有八位谥号为“文正”的汉臣，朱珪是第三位。

嘉庆帝还用一首诗赞扬了朱珪的一生，其中有一句“半生惟独宿，一世不贪钱”，的确是朱珪的写照。他去世时，床上只有一个布被、布褥，甚至不如一个普通人家的排场。40多岁，朱珪丧妻，此后就一直独居，未曾续弦。半生独宿，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志向。

朱珪的从政历程足够光辉了，他18岁中进士，后来当皇子的老师，接着全国地方级的大员做了不少，后来回京又官至宰辅，成为股肱之臣。但是，他的本质还是一个志向高洁、清廉自守的读书人。

中国古代循吏

乐羊子妻的启示

□ 吉炳伟

范晔的《后汉书·列女传》中，《乐羊子妻》中的乐羊子妻虽说不上多有名，甚至她本人姓甚名谁，是谁家的女儿都不知道，但读后令人印象深刻。乐羊子妻帮助丈夫树立美德和成就学业的故事流传至今，十分难能可贵。范晔在传记中突出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故事是拾金不昧。乐羊子在路上行走时，曾经捡到一块别人丢失的金子，拿回家把金子交给了妻子。妻子说：“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廉洁正直的人不接受“嗟来之食”，何况是捡拾别人的失物、谋求私利来玷污自己的品德呢！乐羊子听后十分惭愧，就把金子扔弃到野外，然后远出拜师求学去了。

另一个故事是断机劝学。一年后乐羊子回到家中，妻子跪起身问他回来的缘故。乐羊子说：“久行怀思，无它异也。”出行在外久了，心中想念家人，没有别的特殊的事情。妻子听后，就拿起刀来快步走到织机前说道：“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杼。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捐失成功，稽废时日。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这些丝织品都是从蚕茧中生出，又在织机上织成。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起来，才达到一寸长，一寸一寸地积累，才能成丈成匹。现在如果割断这些正在织着的丝织品，那就无法成功，迟延荒废时光。你积累学问，就应当“每天都学到自己不懂的东西”，以此成就自己的美德。如果中途就回来了，那同切断这丝织品又有什么不同呢？乐羊子被他妻子的话感动了，重新回去修完了自己的学业，并且7年没有回来。

通过这两个小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乐羊子妻的高尚品德和过人才识。乐羊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拿回家，这本身就是个自私的行为，因为金子肯定是别人遗失的，乐羊子之所以拿回家就是有贪财之心。乐羊子妻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与众不同，她不但不收丈夫拾来的金子，还用“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典故说服丈夫，指出因贪小利而失大节的危害，使乐羊子知错就改，并远离家乡寻师求学。很多有偏见的人认为女人比男人更爱贪占小便宜，而乐羊子妻的所作所为颠覆了这一偏见，使身为男子汉的乐羊子非常惭愧。

乐羊子求学一年后回来探亲，按道理无可厚非，也是人之常情，一般人家的妻子肯定是十分欢喜，而乐羊子妻不是这样，看到了乐羊子求学不专的毛病。智慧巧妙地“引刀趋机”，以自己织布必须日积月累“遂成丈匹”的切身体会，说明求学必须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的道理，最后归结到“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乐羊子妻的这一番借织布来讲道理的话，确实很有水平，完全不像一个妇道人家所言，倒像是出自一位很有智慧的哲人大师之口。

这两个小故事讲明了做人做事的两个道理，就是做人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做事必须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前一个故事大家容易理解，不义之财不可得，身外之物不可取，这方面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教训，后一个故事很多人并不明白，干一件事总想马上成功、急于求成，有些事情总是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不能持之以恒。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乐羊子妻用最浅显最直观的事实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学习，乃至其他一切事业，必须从点滴做起，坚持自己的方向，不要轻易地动摇，只有这样才能“积少成多”“厚积薄发”。

古代女贤